
蒙元时代西方在华宗教修会

张国刚 吴莉苇

天主教会与中国的接触始于蒙元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3世纪中后期罗马教廷数次向哈刺和林（Karakorum）的蒙古王廷遣使，14世纪前期则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真正的教区。随着1368年明朝的建立，这些成果很快湮没无存，并且一断就是200多年。蒙元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与晚明清初的传教士有两点不同，其一，他们来华的主要路线是经西亚的陆路，而晚明以后的传教士皆从大西洋入印度洋或太平洋梯航而来，蒙元时期欧亚间陆路的畅通，恐怕还得归功于蒙古骑兵在西亚、东欧的横扫千钧，“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其二，这些传教士以方济各会士为主，而晚明的中国传教区基本是耶稣会士的天下，这是因为此期正是13世纪初叶新生的方济各会大展宏图的阶段。

西方传教士赴蒙古王廷的路线有俄罗斯方向和亚美尼亚方向两条，前者以1245年出使的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mpini）为例，他从法国出发经波西米亚、西里西亚、波兰进入俄罗斯，抵达基辅后一路向东，经第聂伯河、顿河，渡伏尔加河沿里海北缘东行，路经威海和巴尔喀什湖北缘，穿越阿尔泰地区行至蒙古都城哈刺和林。^[2]

1249年奉法王之命出使的安德烈（André de Longjumeau）从安条克（Antioch 或 Antalya，土耳其西南沿海城市）出发向东穿过小亚美尼亚，^[3]尔后向西北直抵第比利斯，然后到位于莫安平原（Moan）的西亚蒙古人营地履行部分使命，或者向东南到大不里士（Taubris 或 Tabriz，位于伊朗西北角），自此先沿里海南岸而行，后东北向到锡尔河谷，然

后向东先后穿越楚河（碎叶河）和巴尔喀什湖南面的伊犁河，最后到达叶密立河畔（Omyly）的蒙古人营地。^[4]

元代方济各会士来华通常是从欧洲越海（多走黑海）到今土耳其境，经由亚美尼亚入伊朗，从伊朗泛舟波斯湾到印度，至此分为两路，一路陆行经今克里米亚入中国境，然后沿旧绿洲丝路到北京，在孟德高维诺来华时尚以此路为安全可靠。^[5]另外一条路线是从印度泛海东来，从广州或泉州登陆。孟德高维诺以后的传教士似乎主要走这条海路，因为陆路虽然便捷，但在 14 世纪初时已因战争而梗阻难行，恐怕较海上风波更为凶险。从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 1265 - 1331）的行程可以约略知道当时这条陆海结合的来华路线。鄂多立克从威尼斯登船经君士坦丁堡到特列比松（Trebizond, 今译特拉布宗，位于黑海南岸的土耳其东北海岸），上岸后向东南行经埃尔祖鲁姆（Erzurum, 位于土耳其东北）、大不里士到孙丹尼牙（Sultaniah, 原为波斯王城，后废），大概在此停留数月，然后向南到卡尚（Kashan, 位于德黑兰南面）、耶兹德（Yezd），继而到北邻巴格达的胡齐斯坦（Khuzestan），^[6]由此入巴格达，从巴格达到波斯湾未走水路而继续陆行到达霍尔木兹，在此乘船赴印度西海岸的塔纳（Thana, 位于孟买之北），沿海岸线一路南行至奎隆，然后到斯里兰卡，到此折而向东，航经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北上历越南而抵中国广州，最后仍走海路到泉州登岸。^[7]回程时也与其他传教士的路线有所不同，由西藏（大概经克什米尔）到巴答黑商（Badakshan 或 Badakchan, 也写为巴达哈伤），然后经伊朗、亚美尼亚返回意大利。^[8]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是返程走海路，自中国到印度并到波斯湾北端的航线与鄂多立克无甚差别，只是自印度登船穿过波斯湾抵巴格达后前去耶路撒冷朝圣，由那里返回法国。^[9]

二

13 世纪中叶，已侵入俄罗斯和波兰的蒙古骑兵令欧洲大为震恐。教皇英诺森四世在 1245 年的里昂公会上明确指出，如果蒙古人不撤退，西方基督教世界就有灭绝危险，于是他决定遣使蒙古王廷探听蒙古人的意图、努力谋求和平并为在蒙古人中传教做铺垫，而方济各会士与多明我会士成为承担使命的当然人选。1214 年成立的多明我会和 1226 年成立的方济各会都以向异教徒传教为首任，13 - 14 世纪尤其是方济各会的活跃时期，因此方济各会士担任起各种前去中亚蒙古王廷的差使，有代表教皇的也有代表世俗君主的，有带政治性的使命也有纯粹的宗教性任务。

教皇在 1245 年决定派出两个使团，其一以方济各会士劳伦斯（Lawrence of Portugal）为首，前去亚美尼亚或其附近，使团似乎在 1247 年方启程并访问了西亚，但好像没能递交 1245 年的教皇书信。^[10]另一个使团由意大利人柏朗嘉宾（1182 - 1252）率领，柏朗嘉宾为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各的密友。一行三人于 1245 年 4 月 16 日出发，先于 1246 年 2 月抵达伏尔加河畔成吉思汗之孙拔都（Batu）的驻地，然后抵达哈刺和林的贵由（Kuyuk）

汗王廷并受到礼遇，^[11] 11月13日带着蒙古首领给教皇的复信动身返回，并于1247年秋天返抵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当时教皇驻跸此地）。^[12] 1247年，教皇第二次向驻扎亚美尼亚一带的蒙古军队遣使，此次使团由四名多明我会士组成，以阿塞林（Ascelin）为首，使团受到蒙古将军拜住（Baiju）的冷遇，并带回一封口气傲慢的回信，以至阿塞林直到1250年才敢返回教皇那里复命。^[13]

13世纪除去罗马教廷的这三个使团外，法王路易九世还曾两度遣使。1248年12月20日，参加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去圣地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听来自西亚蒙古统领野里知给歹（Aljigidai）处的信使说，贵由汗及其母已归信基督，野里知给歹也已受洗，教皇在蒙古人中鼎鼎有名等许多诱人的消息。当然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妄言，但当时国王马上决定向贵由汗遣使，派法国多明我会士安德烈（André de Longjumeau）为大使，另有两位法国多明我会士和四名世俗派教士相陪，携礼物与书信于1249年初动身前往野里知给歹和贵由汗那里，^[14] 经过一年的艰苦行程抵达叶密立的蒙古王廷，但贵由汗已死，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视使团为表达法国臣服之意的贡使，于是接受礼物的同时又以法国为例来训诫几个尚未臣服于蒙古的国王，最后写了一封要求法国朝贡的内容傲慢的回信，派出自己的使节随安德烈一起返回。法王1251年在巴勒斯坦见到了安德烈和蒙古来使以及这封信函，他对自己的遣使举动懊悔不迭。^[15]

1253-1255年间，在亚洲腹地旅行的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quis 或 Rubruck）和另一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则是因为热心于归化异教徒而开始这番冒险，但同时也得到路易九世的资助。因为这期间又有传言说控制顿河到伏尔加河一带的成吉思汗的一位重孙撒里答（Sartach）已皈依基督，这使法王又动了心思，于是以祝贺为名致书撒里答并致蒙古皇帝的书信一起交由鲁布鲁克转递，在致撒里答的信中提出希望在他的土地上建立传教区。鲁布鲁克1253年4月16日自君士坦丁堡起程，8月2日抵达撒里答在伏尔加河附近的营帐，撒里答接见他们后以不能做主为名立刻打发他们去其父拔都在伏尔加河畔的驻所，拔都又让他们去征求蒙哥（Mongka 或 Mangu）汗许可。鲁布鲁克两人12月27日抵达蒙哥在哈刺和林附近的行宫，1254年1月3日受到蒙哥接见，并获准在此地逗留两个月。4月5日他们随蒙哥到达哈刺和林的宫廷并在都城停留了数月，期间鲁布鲁克为五个人施洗并使一位景教神父改宗，同时大汗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1254年7月中旬鲁布鲁克带着给路易王的回信离开蒙古王廷，^[16] 1255年5月返抵塞浦路斯并为法王递交一份报告，报告结尾处提到，像国王这样派遣使者或布道修士去蒙古人处没什么效果，但教皇可以试试隆重地派一位主教去。^[17]

数次出使无论政治任务还是宗教任务其实都鲜有成效，蒙古人对异教的极度宽容并非教廷使者的功劳，反倒是使节受到优待的缘由；蒙古人西扩的停止也并非欧洲来使的劝说，反而是他们一贯持有让欧洲臣服的信念。因此，13世纪后半期的教廷遣使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中亚及蒙古地区的情况，并从蒙古地区有大量基督徒（多为景教徒）这一事实中大受鼓舞。其实13世纪晚期教皇还有过几次向中国遣使的尝试。1271年教皇派两名多明我会士携书信去见忽必烈，原计划随重返中国的马可波罗家族同行，但两位使节行出不

远就被一场战争吓回，于是只有马可波罗一家人到了中国。不久欧洲谣传说忽必烈大汗受洗，于是1278年有一个方济各会传教团准备去中国，但到了伊朗得知那个消息纯属谣传，便又止步不前。^[18]1289年教皇尼古拉(Nicholas)四世再次遣使忽必烈宫廷，这次的特使为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孟德高维诺(1247-1328)，他终于成功地到达中国，并在北京创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

三

孟德高维诺曾在1272-1289年间两度出使东方，这次去中国起因于亚美尼亚国王请求教皇派人去传教，于是教皇又派孟德高维诺带着给包括忽必烈在内的东方各路显要的书信离开欧洲。孟德高维诺在西亚停留许久，到1291年才离开大不里士踏上去中国之路，路程已在前文叙述，1294年到达北京时忽必烈已死，但仍受到新皇铁穆耳(Timur，元成宗)的热情接待，因此虽遭景教徒强烈反对却还是得以在首都居留并着手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

由于元朝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优厚的津贴支持，孟德高维诺的事业进展顺利。1298-1299年间，他在北京建起第一座教堂，后又增设一所钟楼和三口钟，1305年和1318年他又在北京建立两座教堂。到1305年时，孟德高维诺赢得6000归化者，并自称来受洗者陆续不绝，但其中几乎没有汉人。孟德高维诺的传教方针堪当后来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端绪，他一开始就预见到应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于是搜罗了大约40个7-11岁的男孩来培养，加以洗礼后教授他们拉丁文和希腊文，指导他们在教堂服务。与此同时，他将《新约》和《祈祷文》(《诗篇》)译为蒙古文，并用蒙古语举行弥撒。而在走上层路线这一点上，耶稣会士也大可奉孟德高维诺为先驱。孟德高维诺到北京第一年就争取来一个强有力的归化者，皇帝的驸马、高唐王阔里吉德，教名乔治(George)。^[19]他在1305年建的第二座教堂位于正对皇宫大门处，显见其目标是蒙古统治者。^[20]

然而孟德高维诺最大的苦恼是孤军奋战、缺乏后备，直到1303年或1304年才有一位方济各会修士阿尔诺德(Arnold of Cologne)来与他共事，这种状况将严重阻碍传教事业的拓展。他为此慨叹“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21]1305年和1306年的书信正是为了请求增援。1305年的书信大概在1307年春天抵达欧洲，信中描述的成果立刻引起骚动，据说一批多明我会士因此组团计划去中国，但因战争未能成行。^[22]教皇克莱芒五世的反应是，任命孟德高维诺为北京大主教和远东总主教，^[23]并特地晋升7位方济各会士为主教派赴中国为孟德高维诺授职并协助他工作。这7人中似乎只有6人于1307年秋天动身，而3人丧命印度，3名幸存者哲拉德(Gerardo Albuini)、安德鲁(Andrea da Perugia)和裴莱格林(Peregrino da Castello)于1313年抵达中国北京。为孟德高维诺行授职礼后，安德鲁和裴莱格林留在北京主教区帮忙，哲拉德则去泉州(刺桐)执掌新建的主教区。安德鲁等人在北京长年享受皇帝的慷慨赐予，在他1326年的信中提到，皇帝赐

给各色外国人的俸金总数甚至超过了西方一些国王的赋税。^[24]

13世纪前期，方济各会传教区迎来它的鼎盛时期，一大标志是泉州主教区的开辟。泉州能顺利辟为主教区，这首先有赖于泉州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而直接原因则是1313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女侨民在那里捐建一所教区总教堂，并提供巨资维持其用度。哲拉德任泉州主教至1318年去世，裴莱格林从北京来接替，但他1322年便去世。安德鲁也于1318年移居泉州，并在城郊用朝廷俸金修建了一所华丽的教堂居住其中，1322年后他奉孟德高维诺之命接任泉州主教，到1332年去世。

随着传教事业的蒸蒸日上，不断有增派人员到来，因此泉州主教区能够派出方济各会士去杭州和扬州开辟新传教区。裴莱格林1318年1月的信中说，泉州有他本人和3位方济各会修士，北京除孟德高维诺大主教和安德鲁主教外还有一位彼得（Peter of Florence）主教，他是1311年奉教皇克莱芒五世之派出行中国的三位方济各会士主教之一，而他的两位同伴不幸都没能抵达北京。彼得后为泉州末任主教。约1328年离开中国的鄂多立克兴致勃勃地返回欧洲，打算向教皇要求带50名方济各会士重返中国传教，可惜1330年7月抵达意大利，而次年1月便去世了。

活动场所方面，北京有孟德高维诺先期建成的三所教堂，泉州有亚美尼亚女侨民最早捐赠的一座教堂和城郊树林中一块建筑基地（安德鲁大概就利用这块地建教堂）。裴莱格林1318年说亚美尼亚人正在为他们自己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并准备捐献给孟德高维诺。^[25]大约1322年抵达中国的鄂多立克在他自泉州经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清、天津一路北上北京的过程中，目睹了泉州有两处方济各会士的住所，扬州也有一处修会住所。1342—1345年左右在北京并经泉州返回欧洲的巴黎诺里在报告中提到方济各会士在北京有一座大主教会堂和另外几座教堂，并描绘泉州有三座极为富贵高雅的方济各会教堂。

从教传成果来看，除去前述孟德高维诺1306年以前的成绩，1318年时裴莱格林说北京有众多阿兰人（Alans）^[26]被孟德高维诺归化。鄂多立克说杭州的方济各会士争取到一位官员基督徒，而他自己在停留北京的三年期间得以为许多人施洗。^[27]泉州主教区不仅对当地侨民传教，也对中国人传教，但安德鲁称中国偶像教徒“既受洗而不守基督正道者，亦复不鲜”。^[28]由于缺乏资料，元代这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总成果难以确切估算，通常报告说归化者达到3万人。但这一时期的归化者多有景教背景，正如德礼贤指出的，这些人以阿兰人和蒙古人为主，而他们在中国人眼里都是异族，汉族人是否真正受到这次传教的影响则大可质疑。^[29]

无论如何，春天是短暂的。1328年孟德高维诺去世，^[30]所带来的不仅是整个北京城对他的哀悼，更意味着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区和整个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走向衰落。教皇约翰十二于1333年听说这一消息，立刻委任方济各会士、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斯（Nicholas）去填补北京的空缺，他带了26位方济各会神父和6位助理修士随行，但死于中途。1336年一群阿兰基督徒组成的使团奉元帝之派出使教廷，1338年抵达阿维尼翁后趁机向教皇申诉他们的困境，要求向中国派遣特使，于是本笃十二派出巴黎诺里。巴黎诺里1342年抵达中国，但因为害怕已是山雨欲来的政权更替风波波及自身，他在1345年就离

开中国回欧洲。1352或1353年返回阿维尼翁后，马黎诺里在报告中极力描绘在中国受到的善待、皇帝对基督教的热情以及他取得的成就，并热情鼓吹中国传教团的需求。于是教皇英诺森六世命方济各会选派一批会士去中国，甚至晋封其中一些人为主教，但据说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热情，以致无所成就。1362年教皇又任命一位北京大主教，仍未到达目的地，同年第五任泉州主教彼得被代表明朝攻占泉州的中国军兵所杀，泉州主教区也沦入空位期，这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1368年元朝灭亡，局势已是无可挽回，所有外国人都随蒙古人一道被逐出中国，方济各会传教区亦在劫难逃，北京的基督徒在1369年全遭放逐。

四

尽管14世纪后期已经大厦隳颓，教皇还是做了一些挽救传教区的努力。先是将撒莱(Sarai)^[1]大主教调任北京，但他显然无法履行职责。1370年任命又一位担当巴黎大学教授的方济各会士 William of Prato 为北京大主教，他似乎是起身赴任，但从此黄鹤无踪。1371年 Francisco di Podio 作为教宗特使带着12名同伴出发去中国，但也音信杳然。此后的教廷记录中还有10位北京大主教，但这些人是否到过中国都不得而知，有一位是1426年任命的。其中的最后一位在1475年被土耳其人俘虏并关押7年，释放后不久于1483年死于意大利。北京大主教的名衔一直保留到1490年，但后来纯粹是名誉头衔了。元末的动荡以及与元朝截然相反的明初对外政策，使得短期内就蓬勃起来的天主教传教区又在顷刻间消失殆尽。另一方面，14世纪后半叶起，控制中亚和西亚的察合台汗国一反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的宗教宽容政策而大力排斥异教，致使中西陆路梗阻。晚明时，当方济各会士重返中国，当新生的耶稣会士初入中国，天主教会在中国的第一次努力早已片瓦无存，传教士们面对的仍然是一片需要从头垦殖的“荒地”。^[2]西方在华传教士事业在16世纪以后进入了另外一个发展时期。

[1] (英)道森(C. Dawson)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序言〉，第29-3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第110-111页，中华书局，1985年。德礼贤：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 16. 上海，1934年。普布鲁克起点与柏朗嘉宾不同，是自君士坦丁堡动身，但也走俄罗斯境，经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威海到哈刺和林，见何高济译：《普布鲁克东行记》，第201-202页，中华书局，1985年。

[3] 中世纪时的小亚美尼亚王国包括今土耳其南部托罗斯(Taurus, 37 00N 33 00E)山脉以南和奇里乞亚(Cilicia, 37 00N 36 00E)部分地区，向南延伸至巴勒斯坦(Palestine)，此地是从安条克和叙利亚通小亚细亚和里海的大道上有重要战略地位。详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1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序言》，第15页。

- [4] 安德烈东行路线见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之〈英译者序言〉，第198页，中华书局，1985年。Omyl，或作 Imyl、Emil，德礼贤中 (p. 18) 写为 Emir，《元史》作叶密立、也迷里、叶密里。原址在今新疆额敏河畔的额敏县，元初为窝阔台封地，后属其子贵由。见道森：《出使蒙古记》，第76页注释24。
- [5] 此路线见孟德高维诺 (John of Montecorvino) 1305年书信，附载于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32-134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或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62-265页。孟德高维诺并未明言自己走哪条路，只说陆行沿驿路随邮差行走五六月即可到北京，而海路漫长险阻。穆尔的《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书末所附路线图标明孟德高维诺是自海路到广州，然后穿越中国内地到北京；沙百里 (Jean Charbonnier) 的《中国基督教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9页)亦称孟德高维诺抵印度后是从海路驶往中国。孟德高维诺的路线尚不敢贸然断定，但可以肯定1313年抵京的三位主教是从广州登岸，三人之一的安德鲁在1326年的书信中写明他们取道陆路和海路，信的内容也表明他们是到北京之后才逐渐听说泉州的消息。安德鲁的信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36-138页；或道森：《出使古记》第273-275页。泉州建立主教区后，方济各会士似乎就习惯在泉州登岸或出航。
- [6] 从耶兹德到胡齐斯坦的路线不太明了，或者是西北向穿过库尔德斯坦 (Kordestan) 的部分地区，或者是东南向到设拉子再折回西北到胡齐斯坦，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前言〉，第28页，中华书局，1981年。但笔者以为经设拉子的路线不太可能，设拉子离波斯湾要近得多，如果先到设拉子，没必要先折回西北到巴格达然后又回头向东南去波斯湾。
- [7] 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前言〉，第27-28页、第31-65页。
- [8] 鄂多立克对从北京到西藏的路程交待不清，而后人又言说各异，何高济在〈前言〉中说是经天德、山西到西藏 (第28页)；德礼贤提供的路线是经陕西 (Shensi)、四川到西藏 (第28页) Shensi 应指陕西，山西通常拼为 Shansi；鄂多立克的游记中提到他在甘肃境内旅行 (《鄂多立克东游录》，第82页)，似乎是由甘肃入西藏，而这恐怕也是 Latourette 说他回来时从中国西北进入中亚的缘故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71)。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书末所附路线图中，鄂多立克的行程是穿河西走廊后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出中国，但这与鄂多立克自述到过吐蕃皇城不符。另外，无论陕西、山西，还是天德、四川，在《东游录》中译本中都不见。
- 巴答黑商经亨利·玉尔 (H. Yule) 考证为今阿富汗东北边境的费咱巴的 (Faizabad, 今译名法扎巴德)，详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76页。
- [9] 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5-290页；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72。
- [10] 柔克义 (W.W. Rockhill)：《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载《鲁布鲁克东行纪》第193页；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66。
- [11] 冯承钧考证柏朗嘉宾并未至哈刺和林，而是到达大汗驻夏之地 Ormekua，距哈刺和林仅半日路程。但冯承钧言柏朗嘉宾至窝阔台驻夏之地却不对，1246年在位的已是贵由。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35页。
- [12] 柏朗嘉宾使团可见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另可参见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II, 1908年；德礼贤：《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p. 16；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pp. 43-44。

- [13] 有关该使团的简单情况, 参见柔克义:《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鲁布鲁克东行纪》,第194页;道森:《出使蒙古记·序言》,第13页;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 66-67;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II, 1908年。
- [14] 使团离开塞浦路斯的具体日期, 德礼贤称为1月27日(P.17), 柔克义是2月中旬(《东行纪》第196页)。随行人员, 道森说是两名世俗派教士和两名卫士, 见《出使蒙古记·序言》, 第14页。
- [15] 安德烈出使见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p. 17-18; 柔克义:《英译者序言》,《鲁布鲁克东行纪》, 第195-197页。
- [16] 德礼贤称鲁布鲁克离开哈和林的日期是8月18日, 但从《东行纪》第311-315来看, 应是7月10日后不久。其同伴因病未能偕行而留在哈刺和林。
- [17] 鲁布鲁克的经历可见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 18-20;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II, 1908年; Bob Whyte, pp. 43-44.
- [18]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68.
- [19] 乔治王名阔里吉思, 见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 24, n4.
- [20] 孟德高维诺的成绩见其1305年和1306年书信, 附载于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第132-136页。
- [21] 孟德高维诺1305年书信, 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第133页。
- [22]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70.
- [23] 孟德高维诺的东方总主教区在1318年划定界限, 包括东亚大部与小亚细亚, 见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70.
- [24] [28] 见安德鲁1326年书信, 附载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第136页; 第137页。
- [25] 从裴莱格林说到孟德高维诺常和准备捐献教堂的亚美尼亚人在一起这点来看, 这座教堂应该建在北京。裴莱格林书信见道森:《出使蒙古记》, 第270-272页。
- [26] 德礼贤说, 中世纪时的阿兰人居住在高加索地区, 而其相邻之地就是中国史书中所称的奄蔡或阿兰, 见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29, n. 1.
- [27] 耶多立克居留北京的时间无法确切断定, 一般认为是在1322-1328年之间的某三年, 也有认为是1325-1328这三年。
- [29]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 31.
- [30] 有关孟德高维诺的死期有1328年、1329年、1330年、1333年各种说法, 但较常见的说法是1328年。
- [31] 撒莱城有两座, 旧城为1241年左右拔都所建, 在伏尔加河下游, 新城位于伏尔加河的一条支流。见道森:《出使蒙古记》, 第255页, 注释148。
- [32] 元代方济各会在华传教区的相关内容除前引孟德高维诺、裴莱格林和安德鲁的书信外, 还可参见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ume III;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 67-74;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pp. 24-31; 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pp. 43-47.

作者张国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作者吴莉苇: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作者: [张国刚](#), [吴莉苇](#), [Zhang Guogang](#), [Wu Liwei](#)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刊名: [海交史研究](#)
英文刊名: [MARITIME HISTORY STUDIES](#)
年, 卷(期): 2003, ""(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59条)

1. [道森](#). [吕浦](#). [周良霄](#) [出使蒙古记 之〈序言〉](#) 1983
2. [耿昇](#)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1985
3.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1934
4. [何高济](#) [鲁布鲁克东行记](#) 1985
5.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6. [道森](#) [出使蒙古记·序言](#)
7. [何高济](#) [《鲁布鲁克东行记》之〈英译者序言〉](#) 1985
8. [何高济](#) [《鲁布鲁克东行记》之〈英译者序言〉](#)
9. [道森](#) [出使蒙古记](#) 1982
10. [道森](#) [出使蒙古记](#)
11.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12. [穆尔的](#)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1984
13. [沙百里](#) [中国基督徒史](#)
14.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15.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1982
16. [道森](#) [出使蒙古记](#)
17.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18. [或道森](#) [出使古记](#)
19. [道森](#) [出使古记](#)
20. [何高济](#) [《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前言〉](#) 1981
21. [何高济](#) [《鄂多立克东游录》之〈中译者前言〉](#)
22.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23.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24. [或道森](#) [出使蒙古记](#)
25.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26. [道森](#) [出使古记](#)
27.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28. [柔克义](#) [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
29.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30.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31. [耿昇](#)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

32.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1908](#)
33.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34. [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China and Christianity](#)
35. [柔克义 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者序言](#)
36. [道森 出使蒙古记·序言](#)
37.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38.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1908](#)
39. [出使蒙古记·序言](#)
40.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41. [柔克义 英译者序言](#)
42. [高济 鲁布鲁克东行纪](#)
43.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44.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1908](#)
45.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46.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47.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48.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49.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50.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51.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52. [道森 出使蒙古记](#)
53.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54.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55. [道森 出使蒙古记](#)
56. [Henri Cordier The Church in China](#)
57.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58. [德礼贤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59. [Bob Whyte Unfinished Encounter](#)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jsyj20030100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4226cba-b9a4-404f-950a-9e4d007cb6d3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